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百 部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追忆似水年华

II

[法] M·普鲁斯特 / 著

桂裕芳 等 / 译

译 林 出 版 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追忆似水年华

II

[法] M·普鲁斯特 / 著

桂裕芳 袁树仁 / 译

译林出版社

目 次

第二部 在少女们身旁

第一卷 斯万夫人周围 桂裕芳译	3
第二卷 地名：地方 袁树仁译	188

追忆似水年华

第二部

在少女们身旁

第 一 卷

斯万夫人周围

在商量请德·诺布瓦先生第一次来家吃饭时，母亲说，遗憾的是戈达尔教授目前在外旅行，她本人又完全断绝了与斯万的交往，否则这两位陪客会使那位卸任的大使感兴趣的。父亲回答说，像戈达尔这样的显赫上宾、著名学者，会使餐桌大增光彩。可是那位爱好卖弄、唯恐旁人不知自己结交了达官贵人的斯万，其实只是装模作样的庸俗之辈，德·诺布瓦侯爵会用“令人恶心”这个词来形容斯万的。对父亲的这个回答我得稍加解释。某些人可能还记得，戈达尔从前十分平庸，而斯万在社交方面既谦和又有分寸，含蓄得体。但是我父母的旧友斯万除了“小斯万”、赛马俱乐部的斯万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新头衔（而且不会是最后的头衔），即奥黛特的丈夫。他使自己素有的本能、欲望、机智服从于那个女人的卑俗野心，尽力建立一个适合于他伴侣的、由他们两人共有的新的地位，这个新地位大大低于他从前的地位。因此，他的表现判若两人。既然他开始的是第二种生活（虽然他仍然和自己的朋友单独来往。只要他们不主动要求结识奥黛特，他不愿意将她强加于他们），一种和他妻子所共有的、在新交的人之间的生活，那么，为了衡量这些新友人的地位，也就是衡量他们的来访给自己的自尊心所带来的愉快，他所使用的比较尺度不是自己婚前的社交圈子中最杰出的人物，而是奥黛特从前的朋友，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即使人们知道他乐于和粗俗的官员以及政府部门舞会上的花瓶——名声不好的女人来往，但他居然津津乐道地炫耀某办公室副



主任的妻子曾登门拜访斯万夫人，这未免使人愕然，因为他从前（至今仍然）对特威肯汉城^①或白金汉宫的邀请都曾潇洒地保持过缄默。人们也许认为昔日风流倜傥的斯万的纯朴其实只是虚荣心的一种文雅的形式，他们也许认为我父母的这位旧友和某些犹太人一样，轮流表现出他的种族所连续经历的状态，从最不加掩饰的附庸风雅，最赤裸裸的粗野，直到最文雅的彬彬有礼。然而，主要原因——而且这普遍适用于人类——在于这一点，即我们的美德本身并不是时时听任我们支配的某种自由浮动东西，在我们的思想中，美德与我们认为应该实践美德的那些行动紧密相连，因此，当出现另一种类型的活动时，我们束手无策，根本想不到在这个活动中也可以实践同样的美德。斯万对新交无比殷勤，眉飞色舞地一一举出他们的姓名，这种态度好似那些谦虚或慷慨的大艺术家：他们在晚年也许尝试烹饪或园艺，为自己的拿手好菜或花坛沾沾自喜，只能听夸奖，不能听批评。但一旦涉及他们的杰作，他们是乐于倾听批评的；或者说，他们可以慷慨大方地赠送一幅名画，可是在多米诺牌桌上输了四十苏却满不高兴。

谈到戈达尔教授，我们将在很久以后，在拉斯普利埃宫堡维尔迪兰夫人府上再次和他长久相聚。此刻，关于他，只需首先提请注意一点。斯万的变化严格说来无法使我惊讶，因为当我在香榭丽舍大街看见希尔贝特的父亲时，这变化已经完成，只是尚未被我看透罢了。再说他当时没有和我讲话，不可能向我吹嘘他那些政界朋友（即使他这样做，我多半也不能立即觉察到他的虚荣心，因为长时期形成的对某人的看法使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母亲也是一样，在三年里，她竟然没有觉察到侄女嘴上的唇膏，仿佛它溶解在流体之中无影无踪了。直到有一天，过浓的唇膏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引起了所谓超饱和现象，于是从前没有看见的唇膏结成品

^① 此城是法国奥尔良王族流亡英国的居住处。

体,母亲突然看见了缤纷的彩色,大叫可耻,如同在贡布雷一样,并且几乎断绝了与侄女一切来往)。戈达尔的情况却相反,他在维尔迪兰家目睹斯万跨进社交界的那个时期已经相当遥远,而岁月的流逝给他带来了荣誉和头衔。其次,一个人尽可以缺乏文化修养,尽可以做愚蠢的同音异词的文字游戏,但同时仍可以具有一种任何文化修养所无法取代的特殊天赋,例如大战略家或杰出医生的天赋。在同行们眼中,戈达尔不仅仅是靠资历而由无名小卒终于变为驰名欧洲的名医。年轻医生中之佼佼者宣布——至少在几年内,因为标准既然应变化之需要而诞生,它本身也在变化中——万一他们染病,戈达尔教授便是他们唯一能以命相托的人。当然他们愿意和某些文化修养更深、艺术气质更重的主任医生交往,和他们谈论尼采和瓦格纳。戈达尔夫人接待丈夫的同事和学生,盼望有朝一日丈夫能当上医学院院长。人们在晚会上欣赏音乐,戈达尔先生却无意聆听,而去隔壁的客厅里玩牌。然而他的好眼力、他诊断之敏捷、深刻、准确,令人赞叹不已。第三点,关于戈达尔教授对我父亲这种类型的人所采用的声调和态度,应该指出,我们在生活的第二部分所显示出的本质可能是第一本质的发展或衰败、扩大或减弱,但并不永远如此,它有时是相反的本质,是不折不扣的反面。戈达尔青年时代的那种迟疑的神情、过分的腼腆与和蔼曾使他经常受人挖苦,当然迷恋他的维尔迪兰家除外。是哪位慈悲为怀的朋友劝他摆出冷冰冰的面孔呢?由于他的重要地位,这样做是轻而易举的。在维尔迪兰家,他本能地恢复原貌,除此以外,在任何地方,他表现得冷若冰霜,往往是一言不发。而当他不得不说话时,他又往往采取断然的口吻,故意令人不快。他将这种新态度试用于求医者身上,既然求医者以前从未与他谋面,自然无法作比较。他们如果得知戈达尔并非生性粗鲁,准会大吃一惊。戈达尔极力使自己毫无表情。他在医院值班时,讲述同音异义的玩笑引起众人——从主任医生到新来的见习医生——捧腹大笑,而他



的面部肌肉却纹丝不动。由于他剃去了胡须,他的面孔也完全变了样。

最后说说德·诺布瓦侯爵为何许人,战前^① 他曾任全权公使。五月十六日危机期间^② 他任大使。尽管如此,使许多人大为吃惊的是,他后来曾多次代表法兰西出使国外执行重要使命,甚至赴埃及出任债务监督,并施展他非凡的财务能力,屡有建树,而这些使命都是由激进派内阁委任于他的。一般的反动资产者都拒绝为这个内阁效劳,更何况德·诺布瓦先生:他的经历、社会关系和观点都足以使他被内阁视为嫌疑分子。然而,激进派的部长们似乎意识到此种任命可以表明他们襟怀坦白,以法兰西的最高利益为重,说明他们不同于一般政客,而当之无愧地被《辩论报》称为国家要人。最后,他们可以从贵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及剧情突变式的出人意料的任命所引起的关注中得到好处。他们明白,起用德·诺布瓦先生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不用担心后者会违背政治忠诚,因为,侯爵的出身不仅不引起他们的戒备防范,反而使他们放心。在这一点上,共和国政府没有看错。这首先是因为某一类贵族从童年时起就认为贵族姓氏是一种永远不会丧失的内在优势(他的同辈人,或者出身更为高贵的人对这种优势的价值十分清楚),他们知道自己大可不必像众多资产者那样费尽心机地(虽然并无显著效果)发表高见,攀交正人君子,因为这种努力不会给他们增添任何光彩。相反,他们一心想在身份比自己高的王侯或公爵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往姓氏中添加原来所没有的东西:政治影响、文学或艺术声誉、万贯家产。他们无意在资产者所追求的、无用的乡绅身上浪费精力,何况得到一位乡绅的无实效的友谊并不会导致王侯的感激。他们将大量精力使用于能有助

① 指 1870 年普法战争前,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

② 指 1877 年 5 月 16 日法国内阁危机。

于他们担任使馆要职或参加竞选的政治家身上(即使是共济会会员也不在乎),使用于可以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帮助他们进行“突破”的、声誉显赫的艺术家或学者身上,简而言之,使用于一切促使他们扬名,促使他们与富人结成姻亲的人们身上。

德·诺布瓦先生从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吸收了那种消极的、墨守成规的、保守的精神,即所谓“政府精神”,这是一切政府所共有,特别是政府之下各使馆所共有的精神。外交官的职业使他对反对派的手段——那些多少带有革命性的、至少是不恰当的手段——产生憎恶、恐惧和鄙视。只有平民百姓和社交界中少数无知者才认为所谓不同的类型纯系空谈,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不同类型的相互接近不是出于相同的观点,而是出于同血缘的精神。像勒古费这种类型的院士是古典派,但他却为马克西姆·杜冈或梅西埃对维克多·雨果的颂词^①鼓掌,却不愿为克洛代尔对布瓦洛的颂词^②鼓掌。同一个民族主义使巴雷斯^③与他的选民接近——后者对他和乔治·贝里先生^④并不细加区别——却无法使巴雷斯和法兰西学院的同事们接近,因为后者虽然与他政见一致但精神迥异;他们甚至不喜欢他而偏爱政敌里博先生和德沙涅尔^⑤先生;忠诚的保皇派感到与里博和德沙涅尔十分接近,而与莫拉斯及莱翁·都德相当疏远,尽管这两人也希望王朝复辟。德·诺布瓦先生寡言少语,不仅出于谨慎稳重的职业习惯,还由于言语在此类人眼中具有更高的价值,更丰富的含义,因为他们为使两个国家相互接近而作



- ① 即对浪漫主义的颂词。马克西姆·杜冈(1822-1894),法国作家;梅西埃(1829-1915),文学批评家。
- ② 即对古典主义的颂词。克洛代尔(1868-1955),法国作家,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
- ③ 巴雷斯(1862-1923),法国作家,宣传民族主义。
- ④ 乔治·贝里,先为保皇派、右翼议员,后接受进步思想。
- ⑤ 里博,(1842-1923)法国政治家,多次连任法国财政和外交部长。德沙涅尔,法国政治家,主张共和制,曾在1920年担任过几个月共和国总统。

的长达十年的努力,在演讲和议定书中,也不过归纳为、表现为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它貌似平庸,但对他们却意味着整整一个世界。这位在委员会中以冷若冰霜著称的德·诺布瓦先生在开会时坐在我父亲旁边,因此人们纷纷祝贺父亲居然获得这位前大使的好感。父亲本人也感到惊奇,因为他脾气不太随和,除了一小圈知己以外,很少有人和他来往,他本人也确认不讳,他意识到外交家的殷勤是出于一种由本人决定好恶的完全独立的观点;当某人使我们厌烦或不快时,他的全部精神品质或敏感性就丧失作用,它们还不如另一人的爽直轻松能赢得我们的好感,虽然后者在许多人眼中显得空洞、浮浅、毫无价值。“德·诺布瓦又请我吃饭,真是件大事。”委员会里大家都很吃惊,因为他和委员会里的任何人都没有来往。“我敢肯定他又会和我讲关于一八七〇年战争的扣人心弦的事。”父亲知道德·诺布瓦先生也许是唯一一位提请皇帝注意普鲁士的军备扩张和战争意图的人;他知道俾斯麦对德·诺布瓦的智慧表示佩服。就在最近,在歌剧院为狄奥多西皇帝举行的盛大晚会上,报界注意到皇帝曾长时间接见德·诺布瓦先生。“我得打听皇帝的这次访问是否确实重要,”对外交政策颇感兴趣的父亲对我们说,“我知道诺布瓦老头守口如瓶,但他对我可无话不谈。”

在母亲眼中,大使本人也许缺少最能使她感兴趣的那种智慧。应该说德·诺布瓦先生的谈话是某种职业、某个阶层、某个时期——对于这个职业和阶层来说,这个时期可能并未完全废除——所特有的古老的语言形式之大全,我未能将耳闻如实笔录下来,不免感到遗憾,否则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创造语言老朽这个效果,正如罗亚尔宫那位演员一样:有人问他从哪里找到那些令人惊奇的帽子,他回答说:“不是找来的。是保存下来的。”总而言之,我感到母亲认为德·诺布瓦先生有点“过时”。就举止而言,他并未使她不快,但就思想而言——其实德·诺布瓦先生的思想是十分时新的——或许远不如说就语言表述而言,他在她心目中毫无魅力。不

过她感觉到,如果她在丈夫面前对那位对他表示如此少有的偏爱的外交家称赞一番,丈夫定会暗暗得意。她肯定了父亲对德·诺布瓦先生的好评,同时也引导他对自己产生好评,她意识到这是在履行职责:使丈夫愉快,就好比使菜肴精美、使上菜的仆人保持安静一样。她不善于对父亲撒谎,因此就培养自己去欣赏大使,以便诚心诚意地称赞他。何况,她当然欣赏他那和善的神情、稍嫌陈旧的礼节(而且过分拘谨。他走路时,高大的身躯挺得笔直,但一见我母亲乘车驶过,便将刚刚点着的雪茄抛得远远的,摘下帽子向她致意),他那有分寸的谈吐——他尽可能不谈自己,而且时时寻找能使对方高兴的话题——以及其速度令人吃惊的回信。父亲刚寄出一封信就收到回信,父亲看见信封上德·诺布瓦先生的笔迹,第一个反应是莫非这两封信恰巧错过了。难道邮局对他特别优待,加班为他收发信吗?母亲赞叹他虽百事缠身,却复信迅速,虽交游甚广,但仍和蔼可亲。她没有想到这些“虽然”其实正是“因为”,只是她未识别罢了,她没有想到(如同人们对老者的高龄、国王的不拘礼节、外省人的灵通信息感到吃惊一样)德·诺布瓦先生正是出于同一种习惯而既日理万机又复信迅速,既取悦于社交界又对我们和蔼可亲。再者,和所有过分谦虚的人一样,母亲的错误在于将与自己有关的事置于他人之下,即置于他人之外。她认为父亲这位朋友能即刻复信实属难能可贵,其实他每日写大量书信,这只是其中的一封,而她却将它视作大量信件中之例外。同样,她看不出德·诺布瓦先生来我家吃饭仅仅是他众多社交活动中之一项,因为她没想到大使昔日在外交活动中习惯于将应邀吃饭当作职责,习惯于表现出惯常的殷勤,如果要求他在我家一反常态地舍弃这种殷勤,那就未免太过分了。

德·诺布瓦先生第一次来家吃饭的那一年,我还常去香榭丽舍大街玩耍。这顿饭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那天下午我总算能

看拉贝玛^①主演的《菲德尔》^②日场,还因为与德·诺布瓦先生的谈话使我骤然以新的方式感到:希尔贝特·斯万及她父母的一切在我心中所唤醒的感情与他们在其他任何人心中所引起的感情是多么地不同。

新年假期即将到来,我也日益无精打采,因为希尔贝特亲自告诉我在假期中我再见不到她,母亲大概注意到我的神气,想让我解解闷,有一天便对我说:“如果你仍然很想听拉贝玛的戏,我想父亲会同意的,外祖母可以带你去。”

这是因为德·诺布瓦先生曾对父亲说应该让我去听拉贝玛的戏,对年轻人来说这是珍贵的回忆,父亲才改变一贯的态度——他反对我在他所谓的无聊小事(这种看法使外祖母震惊)上浪费时间并冒生病卧床的危险,并且几乎认为既然大使劝我看戏,那么看戏似乎成了飞黄腾达的秘诀之一。外祖母一直认为我能从拉贝玛的戏中学到许多东西,但是,为了我她放弃看戏,为了我的健康她作出巨大牺牲。此刻,她无比惊异,因为德·诺布瓦先生的一句话便使我的健康成为微不足道的东西了。她对我所遵守的呼吸新鲜空气和早睡的生活习惯寄托于理性主义者的坚定希望,因此认为打破习惯便会招来灾祸,她痛心地对父亲说:“您太轻率了!”父亲生气地回答说:“怎么,您现在又不愿意让他听戏!多么荒唐,您不是口口声声说听戏对他有好处吗?”

德·诺布瓦先生在对我至关重要的另一件事上,改变了父亲的意图。父亲一直希望我当外交官,而我却难于接受。即使我在外交部内呆一段时期,但总有一天我会被派往某些国家当大使,而希尔贝特并不住在那里。我愿意恢复从前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时

① 拉贝玛与后文提到的贝玛大妈是同一个人。在某些人名字前加上“拉”,是民间一种习俗用法。

② 《菲德尔》,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的悲剧。

所设想的、后来又放弃的文学打算。但父亲一直反对我从事文学，认为它比外交低贱得多。他甚至不能称它为事业。可是有一天，对新阶层的外交官看不上眼的德·诺布瓦先生竟对父亲说，当作家和当大使一样，受到同样的尊敬，施展同样的影响，而且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噢！真没想到，诺布瓦老爹毫不反对你从事文学，”父亲对我说。父亲是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因此认为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过和重要人物的谈话得到解决，得到圆满的解决，他说：“过几天，开完会后我带他来吃饭。你可以和他谈谈，露一手。好好写点东西给他看。他和《两个世界评论》的社长过从甚密，他会让你进去，他会安排的，这是个精明的老头，确实，他似乎认为外交界，在今天……”

不会和希尔贝特分离，这种幸福使我产生了写篇好文章给德·诺布瓦先生看的愿望——而不是能力。我动手写了几页便感到厌烦，笔从我手中落下，我恼怒得哭了起来。我想到自己永远是庸才，想到自己毫无天赋，连即将来访的德·诺布瓦先生向我提供的永不离开巴黎的良机都没有能力利用。当我想到能去听拉贝玛的戏时，胸中的忧愁才有所排解。我喜爱的景色是海滨风暴，因为它最猛烈，与此相仿，我最喜欢这位名演员扮演的，是传统角色，因为斯万曾对我说她扮演这些角色的艺术堪称炉火纯青。当我们希望接受某种自然印象或艺术印象从而获得宝贵的发现时，我们当然不愿让心灵接受可能使我们对美的准确价值产生谬误的、较为低劣的印象。拉贝玛演出《安德罗玛克》、《反复无常的玛丽安娜》、《菲德尔》，这是我的想象力渴望已久的精彩场面。如果我能听见拉贝玛吟诵这段诗句：听说您即将离我们远去，大人……^①等等，

^① 《菲德尔》第五幕第一场的台词。

那我会心醉神迷；就仿佛在威尼斯乘小船去弗拉里教堂欣赏提香^① 圣母像或者观看卡帕契奥^② 的系列画《斯基亚沃尼的圣乔治》一样。这些诗句，我已经在白纸黑字的简单复制品中读过，但我将看见它们在金嗓子所带来的空气和阳光中出现，好比是实现了旅行的梦想，我想到这里时，心便剧烈地跳动。威尼斯的卡帕契奥，《菲德尔》中的拉贝玛，这是绘画艺术和戏剧艺术中的杰作，它们所具有的魅力使它们在我身上富有生命力，使我感到卡帕契奥和威尼斯、拉贝玛和《菲德尔》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如果我在卢浮宫的画廊里观看卡帕契奥的画，或者在某出我从未听说的戏中听拉贝玛朗诵，我便不会再产生美妙的惊叹，不会再感到终于看见使我梦绕魂萦的、不可思议的、无与伦比的杰作，其次，既然我期待从拉贝玛的表演中得到高贵和痛苦的某些方面的启示，如果女演员用她卓越和真实的艺术来表演一部有价值的作品，而不是在平庸粗俗的情节上添点儿真和美，那么，这种表演会更加卓越和真实。

总之，如果拉贝玛表演的是一出新戏，我便难以对她的演技和朗诵作出判断，因为我无法将我事先不知道的台词与她的语调手势所加之于上的东西区别开，我会觉得它们和台词本是一体。相反，我能倒背如流的老剧本仿佛是特有的、准备好的广大空间，我能完全自由地判断拉贝玛如何将它当作壁画而发挥她那富有新意的创造力。可惜几年前她离开了大舞台，成为一个通俗剧团的名角，为它立下汗马功劳。她不再表演古典戏剧。我常常翻阅广告，但看到的总是某某时髦作家专门为她炮制的新戏。有一天，我在戏栏里寻找元旦那一周的日场演出预告，第一次看到——在压轴节目中，因为开场小戏毫无意义，它的名字显得晦暗，其中包含对我陌生的一切特殊情节——拉贝玛夫人演出《菲德尔》中的两幕，

① 提香(1477 - 1576)，意大利画家。

② 卡帕契奥(1455 - 1525)，意大利画家。

还有第二天第三天的《半上流社会》和《反复无常的玛丽安娜》。这些名字象《菲德尔》名字一样，在我眼前显得晶莹可鉴、光亮照人（因为我很熟悉它们），闪烁着艺术的微笑。它们似乎为拉贝玛夫人增添光彩，因为在看完报上的节目预告以后，我又读到一则消息，说拉贝玛夫人决定亲自再次向公众表演往日创造的角色。看来艺术家知道某些角色的意义不仅限于初次上演、使观众一新耳目，或再次上演而大获成功。她将所扮演的角色视作博物馆的珍品——向曾经欣赏珍品的老一代或未曾目睹珍品的新一代再次展示的珍品，这的确是十分有益的。在仅仅用来消磨夜晚时光的那些演出的预告中，她塞进了《菲德尔》这个名字，它并不比别的名字长，也未采用不同的字体，但她心照不宣地将它塞了进去，仿佛女主人在请客人入席时，将他们——普通客人——的名字——告诉你，然后用同样的声调介绍贵宾：阿纳托尔·法朗士先生。



给我看病的医生，即禁止我作任何旅行的那位，劝父母不要让我去看戏，说我回来以后会生病的，而且可能病得很久，总之，我的痛苦将大于乐趣。如果我期待于剧院的仅仅是乐趣，那么，这种顾虑会使我望而却步，因为痛苦将会淹没乐趣。然而——正如我梦寐以求的巴尔贝克之行、威尼斯之行一样——我所期待于这场演出的，不是乐趣，而是其他，是比我生活的世界更为真实的世界的真理。这些真理，一旦被 I 获得，便再也不会被我那闲散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小事所夺去，即使这些小事使我的肉体承受痛苦。我在剧场中所感到的乐趣可能仅仅是感知真理的必要形式，但我不愿它受到影响和破坏，我盼望自己在演出结束以后才像预料中的那样感到身体不适。我恳求父母让我去看《菲德尔》，但是自从见过医生以后，他们便执意不允。我时时为自己背诵诗句：听说您即将离我们远去……我的声调尽量抑扬顿挫，以便更好地欣赏贝玛朗诵中的不平凡之处。她的表演所将揭示的神圣的美如同圣殿中之圣殿一样隐藏在帷幔之后，我看不见它，但我时时想象它的新面

貌。我想到希尔贝特找到那本小册子中的贝戈特的话：“高贵的仪表，基督徒的朴素，冉森派的严峻，特雷泽公主及克莱芙公主^①，迈锡尼的戏剧^②，泽尔菲的象征^③，太阳的神话”。这种神圣的美不分昼夜地高踞在我内心深处的、永远烛火通明的祭坛之上，而我那严厉而轻率的父母将决定我能否将这位女神（她将在原来隐藏着她无形形象的地方显露真面目）的美吸进，永远吸进我的精神之中。我的目光凝视着那难以想象的形象，我整日与家庭的障碍搏斗，但是当障碍被扫平，当母亲——尽管这个日场戏正好是委员会开会，而会后父亲将带德·诺布瓦先生来家吃饭的那一天——对我说：“唉，我们不愿意使你不高兴，如果你实在想去那就去吧。”当一直作为禁忌的戏院此刻只由我来决定取舍，我将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实现宿愿时，我却反而犹豫不决，是该去还是不该去，是否除了父母的反对以外尚有其他否定的理由。首先，虽然他们最初的残酷让我讨厌，但此刻的允诺却使我觉得他们十分亲切。因此，一想到会使他们难过，我自己就感到难过，在这种情绪之下，生活的目的对我来说似乎不再是真理，而是柔情，生活的好与坏的标准似乎只是由我父母快活还是不快活而定。“如果这会使您不快活的话，我就不去了，”我对母亲这样说。她却反过来叫我不必有这种顾虑，这种顾虑会破坏我从《菲德尔》中得到的乐趣，而她和父亲正是考虑到我的乐趣才解除禁令的。这样一来，乐趣似乎成为某种十分沉重的义务。其次，如果看戏归来病倒的话，我能很快痊愈吗？因为假期一结束，希尔贝特一回到香榭丽舍大街，我便要去看她。为了决定看不看戏，我将这全部理由与我对拉贝玛完美艺术的想象（虽然它在面纱下难以看见）作比较，在天平的一端我放上“感到妈

① 指古典悲剧女主人公菲德尔及小说人物克莱芙公主，这是两种不同的典型。

② 希腊初期文化。

③ 泽尔菲是古希腊城，有太阳神阿波罗的圣殿。